

智 慧 的 探 索

中 国 哲 学

1995

● SHANGHAI REN 张汝伦 主编 MIN CHUBANSHE

智 慧 的 探 索

中 国 哲 学

1995

张汝伦 主编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王晓阳

智慧的探索

——中国哲学·1995

张汝伦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插页 5 字数 182,000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175-9/B·216

定价 15.00 元

编 者 序

张 汝 伦

哲学这门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学问，目前正面临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哲学的危机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普遍的精神文化危机相联系。这点恰恰证明了王国维对它的体认：“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①如果哲学真是与人类文明休戚相关，须臾不可相离，那么哲学的危机也许并非它要灭亡的标志，而是它新生的契机也未可知。在目前的文化状况下每年选编一本哲学论文集，恰好可使我们对目前的哲学状态与问题有真切的认识与把握，从而促进对哲学本身及其前途的进一步思考与努力。哲学的希望，也许正孕育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思考与努力之中。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1994年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一些哲学论文的选集。它并未包括中国学者当年在一些重要的哲学领域，如美学和逻辑学方面的论文。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学者该年在这些领域的努力乏善可陈。如此安排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使人们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对中国大陆的哲学发展现状有一个基本了解。

在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分类中，本没有“哲学”这个名称。直到本世纪初（1902年）中国人才从日本人那里引进了 philosophy 一词的汉文译名“哲学”，并将其用于中国传统思想。从此，

我国才有哲学这门学科，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事实表明，与文学和历史这两门人文科学的基本学科不同，现代中国哲学基本上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接触中，在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这个事实对于把握现代中国哲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可是，虽然“哲学”从起源上讲是西方的产物，它完全不可能只为西方所有，而不能成为一门全人类的普遍学问。正如张岱年先生曾指出的：“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哲学。”^②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尽管各文化传统的哲学有其特殊性，但是，由于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否则，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就难以沟通和会通，世界上就只能是西方哲学。目前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块，哲学研究者几乎无例外地将自己隶属于其中某一领域的状况，恰好说明了我国哲学研究目前的问题所在。

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内容等等的区别。与其它人类文化领域一样，哲学之为哲学，是由其本质的研究对象和标志其本质的基本问题来确定的，否则就无法界定和判断何为哲学。因此，无论是中西哲学抑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它们是哲学，就应该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

在于对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哲学与其它学科相比显得少有进步，就因为这些问题的深刻性和基本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而只能随着人类的历史存在不断地重新加以提出。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哲学研究不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而是说哲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和现代中国哲学起源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提和前途都在中西哲学的会通。现代中国哲学的先驱王国维早就指出：“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③

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不久前去世的冯契先生是不多的几个对中西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很高造诣的人之一。他一直强调要融汇贯通中西哲学，中国哲学才能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本人的哲学著作是他自己在这方面努力的忠实记录和结晶。冯先生晚年一直致力于他的三部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为《智慧说三篇》的整理工作，可惜未能最后完成他就去世了。本论文集选刊的《智慧的探索》一文，是《智慧说三篇》的导论。该文全面叙述了冯先生毕生的哲学历程和他最终的哲学观点，是准确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宝贵文献。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是冯先生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的反思与总结。它回顾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肯定了它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它的问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冯契对未来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在哲学面临普遍危机的关头重新提出了哲学的原始概念，这就是要“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

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引自《智慧的探索》）本来，哲学作为爱智之学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一字未留下，却被西方人尊为“哲学之父”。古希腊人大都同时关心知与行，著名的“德行即知识”的命题即体现了古希腊人知行合一的哲学理想。中国古代哲人更是始终将“践履”和“知行合一”放在学问的首位。近代以来人们将哲学类比地理解为只是一种像一切科学理论那样的“理论”，使得哲学越来越与人们的生活与存在脱节。冯契对哲学的独到认识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指明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方向。

本体论问题向来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热门主题。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它成了治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共同话题。可是，由于上述哲学传统的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关于“本体论”（实际应译为“存在论”为好，理由在本论文集所造的俞宣孟的文章中可见）的谈论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出入很大。关键是许多人对“本体论”（ontology）的西方哲学的独特起源缺乏了解，因而以讹传讹，造成了不少误解，影响了中西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传统的建设性对话与会通。俞宣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本体论”的原始定义和本质特征，指出了人们对它的种种误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本体论的观点。这篇文章当然不可能是关于本体论问题的最后定论，但它对于澄清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

人——主体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高青海教授的《主体呼唤的历史根据和时代内涵》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出发，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语境，回顾了主体形态的历史生成，论证了今天我们弘扬主体的时代内涵即在于培植独立的个人主体，形成所谓的现代人格。相信高青海的这

个观点会为许多人认同。当然，主体问题的哲学内容可能远远不止培植个人主体这一点。

意识形态及其与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我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论》一文讨论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定义的分野，梳理了马克思以来一些主要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提出明确区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考虑到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哲学与意识形态相等同，这种区分对于哲学的健康发展应该是有益的。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最近十几年一直很热闹，但往往流于简单的“批判”或“弘扬”，真正“哲学的”研究并不多见。庞朴先生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却一直是典型的“哲学的”研究。他的“解牛之解”通过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道阐释为“实践”，对中国传统哲学中“道”与“行”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分析，独具一格地在学理层面上论证了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特征，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金景芳、吕绍纲两先生的《论〈中庸〉》通过对儒家哲学的经典《中庸》的篇名及它所包含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的细致分析，指出了《中庸》的原始意义与朱熹对《中庸》解释的重要区别。这对于全面理解《中庸》这篇儒家哲学的重要经典无疑是有益的，尤其是针对用理学家的诠释来读先秦儒家典籍的时弊更有提醒与纠偏的作用。至于朱熹的诠释是否与《中庸》的原始义理完全不合，恐怕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无论如何，宋明理学是儒家哲学的重大转折与发展。然而，没有佛教思想的影响，这种重大的转折与发展是否可能，的确是值得怀疑的。方立天教授的论文《性禅自悟》通过对禅宗经典《坛经》的研究分析，揭示了慧能心性论的范畴、内涵、结构与特点，从而使我们不仅对慧能的心性论，而且对佛教思想构成理学

的一个潜在的思想资源这一点,有更为肯定的认识。

过去十几年,我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标志是研究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规范。叶秀山先生是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专家。尤其在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上,很有成就。《古希腊原子论的“原子”与“空无”观念》是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文章在对古希腊哲学资料的仔细分析和疏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古代希腊原子论的“原子”与“空无”的观念。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是近年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大热门,各种有关海德格尔的论著层出不穷。这不仅证明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吸引力,也证明了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哲学领悟的深入。张祥龙的《海德格尔与前柏拉图哲学》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通过分析阐述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独创性理解与阐释,表明了前苏格拉底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

“后现代”也是近年来中国学者谈论得很多的话题。但谈论“后现代”的人往往只是捕风捉影,想当然地任意讲一通,对后现代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根本没有深入细致的研读和理解。“后现代”或“后现代哲学”对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随心所欲使用的名词。赵敦华、江立成两先生写的《后现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一文是我见到的第一篇建立在基本材料的扎实掌握上的对后现代哲学的认真研究。文章对后现代哲学的定义,“谱系”,问题及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逐一作了论述,并对它提出了批判性的看法。对于一切想了解后现代哲学为何的人来说,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论文。

技术问题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与风险。然而,长期以

来,人们常常想当然地将技术视为完全中性的手段或工具体系。高亮华的《技术的伦理与政治意含》一文却向我们介绍了国外越来越流行的一种新技术观,这就是:技术本身并不是清白的;技术远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相反,技术是负载价值的,具有其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丰富意含。但作者并不是简单介绍,而是具体分析了技术的复杂特征与各派主张的独到见解和不足,在此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技术负载价值这一主题。这篇论文对于持工具论技术观和技术乐观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提醒。

本论文集的十一篇论文雄辩地证明,尽管面临种种困境与问题,中国的哲学研究与哲学思维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智慧的光芒必将照亮这个伟大民族腾飞的前程。诚然,与前辈大师旷古绝伦的成就相比,这里记录下的只是当代中国人些许智慧的真诚努力,但人类一切精神成果不就孕育在这样的真诚努力中吗?

是为序

1995年10月4日于复旦

注 释:

- ①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页。
- ③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目 录

编者序	张汝伦(1)
-----	----------

智慧的探索	冯 契(1)
-------	----------

——《智慧说三篇》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问题	俞宣孟(32)
---------------	-----------

主体呼唤的历史根据和时代内涵	高清海(51)
----------------	-----------

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论	张汝伦(64)
------------	-----------

——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解牛之解	庞 朴(102)
------	------------

论《中庸》	金景芳 吕绍纲(128)
-------	----------------

——兼析朱熹“中庸”说之谬

性净自悟	方立天(148)
------	------------

——慧能《坛经》的心性论

古代希腊原子论的“原子”与“空无”观念	叶秀山(161)
---------------------	------------

海德格尔与前柏拉图哲学	张祥龙(176)
-------------	------------

后现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	赵敦华 江立成(191)
-----------------	----------------

技术的伦理与政治意含	马亮华(209)
------------	------------

附 录

1994 年出版的哲学书籍要目	(223)
-----------------	---------

1994 年发表的哲学论文要目	(226)
-----------------	---------

1994 年《哲学研究》第 1~12 期分类总目录	(235)
---------------------------	---------

智慧的探索

——《智慧说三篇》导论

冯 契

我把正在整理的三本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为《智慧说三篇》。在“导论”中，想扼要说明一下：这三篇著作要回答什么问题，我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探索过程，它们的主旨及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一、时代的问题

1. “古今、中西”之争

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进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5年进大学时碰上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一切爱国青年、有志之士，都满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思索。年轻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这一问题，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

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当然，“古今中西”之争所反映的时代中心问题是发展的，1949年以前，主要是革命的问题，1949年以后，主要是建设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

在不同的领域，“古今、中西”之争各有其特殊性。就哲学而言，现实生活中即革命和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这样就使得在中国近代，历史观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古今中西”之争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同时，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如何正确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所以认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也特别突出。而与认识论和历史观问题相联系着，逻辑和方法论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问题，也成了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使近代中国人面临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哲学探讨也突出地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之中。简言之，时代给哲学领域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哲学家对现有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来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有与自己的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又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与民族经济将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发扬民族特色而逐渐走向世界，将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从哲学本身来看，也有一个古今中西的关系。一般地说，凡是在近现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

不过，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表现为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如果问题老得不到解决，他就难免心有郁结，甚至产生如黄宗羲所说的“龙辜虎跛、壮士囚缚”的心态，迫使他作强力的挣扎、抗争。如果他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有所前进，就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韩愈说“不平则鸣”。社会之不平、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借助语言文字形象地把这种“不平”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作品。若言之无物，没有真切的感受而无病呻吟，那不可能是好文章。同样，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下面讲讲我在哲学领域真切感受到的问题及其时代意义。

2.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

我早就对哲学有兴趣，进大学考的就是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涉猎甚广，中外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但真正

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是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跟从金岳霖先生读书，认真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和金先生讨论时，我感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金岳霖先生区别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的论点。

我当时觉得，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人”，我以为应该 是用 Epistemology 来代替 Theory of 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认识论研究中，也是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金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说：他讲知识论，确是只讲知识经验，即他所谓“名言世界”。他认为我讲的“智慧”，涉及了“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表达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理智无法过问的，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讨论到后来，他又说：“你的话也有道理，你的看法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他鼓励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在这之后，他与我几次讨论到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金先生说他在写成《知识论》之后，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他认为，“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说不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这是他当时甚感兴趣的哲学问题。

我后来认识到，我和金先生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知识与智

慧的关系问题。关于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以及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能“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亦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金先生当时着重探讨了后一个问题，写了《势至原则》一文，收在他的论文集中。最近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谈了他当时和我的讨论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如何能说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探索。而我当时有一个与他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虽然智慧的获得与表达不可分割，但首先应该问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达”。所以，我想着重考察前者，把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发展视为辩证过程，试图来说明“转识成智”是如何实现的，亦即想探讨一下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的机制。我跟金岳霖先生、汤用彤先生就此问题作了几次讨论，后来我从庄子《齐物论》得到一些启发，在1944年写成一篇论文《智慧》，后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当时我写好后，自己不太满意，因为它显得太学院气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更觉得很幼稚。但我确实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真切的感受。从这以后，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到底如何，便成为我一直关怀、经常思索的问题。

不过我当时的提法是：在由意见、知识发展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则是“以道观之”，单纯从“观”来区分认识的阶段，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后来我在提法上稍作改变，把认识过程看成是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我的任务就在于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

3. 知识与智慧关系问题的时代意义

当我碰到了知识与智慧及其关系这一具体哲学问题后，我就再也放不下它。那么，这一问题有什么时代意义呢？

在与金先生讨论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问题之后，我越来越感到，他内心有一个矛盾，有点类似于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王国维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他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就是指叔本华、尼采这一派哲学，即西方近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他所谓的“可信者不可爱”，就是指孔德、穆勒以来的实证论、科学主义的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论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近代西方科学和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王国维感到这一矛盾很难解决，故产生了极大的苦闷。他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就放弃了哲学研究。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继续发展着。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金岳霖先生区分了知识论态度和元学态度，以为知识论是只讲可信的即实证知识的领域（即只讨论实证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元学就不仅要求理智上的了解，而且要求情感上的满足，即要求是可爱的。他实际上是试图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来解决“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办法，是把知识和智慧截然割裂开来了，从而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也无法解决科学和人生脱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金先生也没有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矛盾。

在“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与东西文化论战相联系着的。科学派多半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领域非科学所能够解